

苏东坡大传

插图本

下

(台湾) 李一冰 著

九州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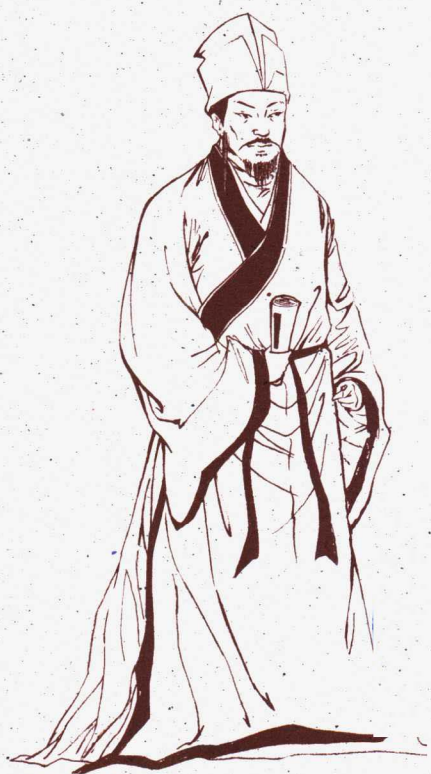
苏东坡大传

下

插图本

(台湾) 李一冰 著

九州出版社



目 录

上 册

第一章 食蓼少年

- 一 蜀道难 1
- 二 宋之平蜀 3
- 三 世系 6
- 四 双亲 9
- 五 少年 12
- 六 但愿一识张益州 17
- 七 登进士第 20
- 八 母丧 26
- 九 南行 29
- 十 老苏的一官难求 32
- 十一 制策之试 34

第二章 变法与党争

- 一 初仕凤翔 39
- 二 怀乡念弟 43
- 三 陈希亮 45
- 四 亡妻·丧父 49
- 五 荆公变法 52
- 六 党争的发端 58
- 七 新政风暴 60
- 八 上皇帝书 65
- 九 遭诬 71
- 十 惘惘出都 75

第三章 马入尘埃

- 一 湖畔孤鸿 79
- 二 湖寺寻僧 82
- 三 监试乡举 86
- 四 相度堤岸工程 90
- 五 富春山行 94

六	红裙白酒	97
七	常润道中	100
八	别西湖	105
九	密州利病	108
十	超然台与盖公堂	112

第四章 黄楼

一	做客东园	117
二	谏用兵书	122
三	徐州大水	126
四	秦七黄九	129
五	黄楼之会	132
六	诗僧参寥	134
七	文同	136
八	重游江南	138

第五章 乌台诗狱

一	始作俑者——沈括	141
二	被台谏围剿	142
三	追捕	145
四	勘问	147
五	审理	149
六	论救	151
七	定讞	154

第六章 黄州五年

一	出狱赴黄	159
二	初到黄州	162
三	孤立于风雨沙州	166
四	朋友	170
五	东坡	173
六	书斋生活	177
七	饮食生活	183
八	黄泥坂和赤壁	188
九	临臬·东坡·雪堂	193
十	老农忧国	197
十一	神宗的救赎	202
十二	别黄州	205

第七章 漂泊江淮

- 一 庐山纪游 208
- 二 访弟·殒子 213
- 三 金陵谒荆公 219
- 四 求田问舍 223
- 五 南都来去 228
- 六 阳羨一梦 231

第八章 风雨京华

- 一 元祐更化 235
- 二 从调和到冲突 239
- 三 不到中书不是官 243
- 四 老成凋谢 247
- 五 学士院风波 250
- 六 经筵与驱程 255
- 七 元祐党争 259
- 八 一士谔谔 264
- 九 试院抡才 266
- 十 金莲烛 270
- 十一 乞郡避谤 274

下 册

第九章 书斋内外

- 一 一家融融 281
- 二 苏门六君子 284
- 三 王巩 289
- 四 画友 291
- 五 文字生涯 297
- 六 书法 301
- 七 绘画 306
- 八 书斋文物 312
- 九 宴游和谐谑 316
- 十 重结西湖缘 319

第十章 杭州去来

- 一 储粮防灾 323
- 二 吏治 327
- 三 治六井·开西湖 330
- 四 僚友 334

五	方外交	339
六	救灾和水利	344
七	奉召还朝	348
八	破琴之梦	352
九	竹寺题诗案	358
十	东府感旧	363
第十一章 颍州·扬州·定州		
一	颍水之鱼	366
二	颍扬之治	370
三	广陵生活	374
四	初和陶诗	377
五	二次还朝	382
六	再被围攻	387
七	丧偶	392
八	太后崩逝	395
九	守边定州	399
十	再还谪逐	404
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		
一	远谪南荒	410
二	过岭	416
三	初到惠州	419
四	借刀杀人之计	425
五	劳己以“为人”	430
六	服食养生	434
七	朝云之死	440
八	惠州和陶	444
九	白鹤峰新居	448
十	又贬海外	453
第十三章 海外东坡		
一	海南风土	460
二	食芋饮水	463
三	房屋风波	467
四	读书著作	472
五	家人朋友	477
六	采药与造墨	481
七	别海南	483

第十四章 北归

一 秦观之丧	489
二 广州·英州	491
三 韶州	494
四 虔州	498
五 归程何处是	502
六 染疾	505
七 逝世	510
八 浩气不亡	513
九 子孙	516
十 身后	520
附 录	
苏东坡及宋大事年表	524
参考书目	532

一 一家融融

苏轼元祐还朝，虽然被人强迫戴上党派的帽子，被官僚集团围剿得遍体鳞伤、身心交瘁，但他这一时期的私人生活，却是多姿多彩，非常充实。

汴京比较高级的朝官，为了上朝方便，大都住在皇城附近。这皇城的城门，朱漆金钉，非常辉煌，城壁砖石间，嵌着龙凤飞云的图案，雕梁画栋，峻栊层榭，城楼上覆盖的琉璃瓦，在太阳下闪烁生光，真是一派皇家气象，帝阙风光。沿着皇城城墙，整整齐齐种着高槐古柳，浓荫覆地，宁静有如山居。杨奂《汴故宫记》：

登闻鼓院之西，曰右掖门，翰林知制诰者，多居西掖。

黄庭坚有《雨过至城西苏家》诗，颇能写出当地的景色如画：

飘然一雨洒青春，九陌净无车马尘；

渐散紫烟笼帝阙，稍回晴日丽天津。

花飞衣袖红香湿，柳拂鞍鞯绿色匀；

管领风光唯痛饮，都城谁是得闲人。

苏氏兄弟并不住在一起，但是苏轼退朝，常常先到苏辙家盘桓一番，然后回家，相距应不甚远。

二苏自分别出仕以来，已有二十余年不能同在一地居住，现在虽然还不能达到“同归林下，夜雨对床”的乐境，但比两地分居，动辄要三五年才得晤叙一次，却要好得多了。两兄弟公余之暇，日有过从，可以元祐三年十月作《出局诗》为证。那一天，苏轼局中早出，天色阴晦欲雪，而苏辙在户部因公未归，苏轼便在家里煮酒等他，并作出局诗。苏辙还有一个乳名叫“卯君”，此因他生于宝元二年己卯之故。诗云：“急景归来早，浓荫晚不开，倾杯不能饮，待得卯君来。”

二苏友爱之笃，固是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，而彼此互爱子侄，却也毫无异致。如元祐二年除夕，苏辙被派在办公厅里值夜（省宿致斋），不能回家，他家孩子们过年不见爸爸，当然很失望，第二天元旦，苏轼朝贺一毕，帽子上插了御赐的银幡，立刻赶往弟弟家去，陪他的侄子们玩耍。做诗三首，录一：

白发苍颜五十三，家人遥遣试春衫；

朝回两袖天香满，头上银幡笑阿咸。

苏轼家二十余口，除长子苏迈尚在江西当德兴县尉外，其他人自王夫人以下，十七岁的苏迨，十五岁的苏过，侍妾朝云等，一家团叙，其乐融融。《次韵和王巩诗》说：“子还可责同元亮，妻却差贤胜敬通。”太太不妒忌，儿子个个好学，使他觉得比汉朝的冯衍、晋朝的陶潜幸运得多。

王夫人出身青神农家，她有农家妇女刻苦耐劳的习性，是治家能手，虽然教育

程度上有点隔阂，因此不能充分了解她的丈夫，但她谨守传统的妇德，一切依从他、敬爱他，尊重他的一切爱好，包括容纳朝云在内。

朝云冰雪聪明，善伺人意，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。

例如有一日，苏轼退朝还家，食罢，按照他的养生法，在室内扞腹徐行。旁有侍儿，他忽然指着自己的大肚皮问她们道：“你们且说，此中藏有何物？”一婢说：“都是文章。”一婢说：“都是识见。”主人摇头不以为然。朝云说：“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。”

苏轼捧腹大笑——果然是个红粉知己。

全家抵京后半年，苏辙上《乞兄子迈罢德兴尉状》，大约未久长子那一房也已来京团聚。苏迈照当时大户人家早婚的风习，十九岁即已娶妇，娶的是同乡世交王宜甫的女儿。翌年元丰元年，苏轼就已有孙儿苏箬，此时，他家一个屋檐下，已经三代同堂，儿孙绕膝，充满了笑语。

苏轼抵京不久，即往晋谒师门，拜见师母——欧阳太夫人。欧阳修的长子发（伯和）已经过世了，遂与欧阳斐（叔弼）、辩（季默）兄弟常时交往。欧阳家托苏轼撰《文忠公神道碑》；苏轼则入见太夫人，为他十七岁的次子苏迨求婚于欧阳斐的千金，太夫人说这是“师友之义”，一口允诺。从此与师门又成了儿女姻亲。

苏轼在京，公事既忙，再因朋友众多，趣味广泛，所以很少会有在家空闲的时光。不过他对于儿子的学业还是非常用心的，次子苏迨虽然长大了，但是身体还是病弱，所以不太管他，对稚子苏过则常亲自督教。叔党天性，最像父亲，非常努力于诗赋的学习，诗赋是当时科举的主科，又是苏门光辉的家学，苏轼手写一则《论诗之写物》给他，开导他作写物诗的诀窍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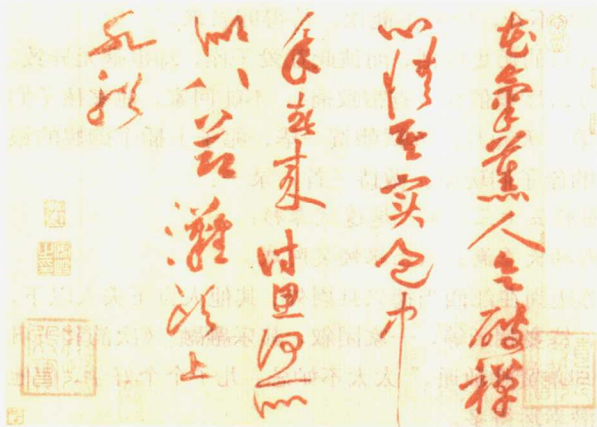
诗有写物之工，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，他木殆不可以当此。林逋梅花诗：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黄昏，绝非桃李诗也。皮日休白莲诗云：“无情有恨何人见，月晓风清欲堕时。”绝非红莲诗。此乃写物之工。若石曼卿红梅诗：“认桃无绿叶，辨杏有青枝。”此至陋，盖村学中语。

有一次，苏过念书，父亲睡在床上听。读到一个段落时，苏轼便对儿子说道：

“王僧虔家住健康禁中里马粪巷，子孙贤实谦和，当时人称誉马粪王家都是长厚的人。东汉赞论李固，有句话说：‘视胡广赵戒如粪土。’——粪土本是秽物，但用在王僧虔家，便是佳号；用来比胡、赵，则粪土有时而不幸。”

——前者是修辞的技法，后者则是真切明白的人格教育，两者皆不偏废。

苏轼平常生活，很有秩



◎ 黄庭坚墨迹

序，讲究养生之道。他在家晨兴夜寝，各有一定的法门：

每日五更初起床，梳头数百遍。盥洗后，就和衣还卧另一干净榻上，假寐数刻，据说“美不可言”；直到天色平明，吏役齐集，他即起身换朝服，冠带上马，入宫早朝。

夜眠，苏轼颇以“自得此中三昧”为豪，他的方法是：初睡即在床上安置四体，使无一处不稳；如有一处未稳，即重新安排，务令稳贴。身体上如有任何轻微倦痛的地方，则略自按摩，然后闭目，静听自己的呼吸，直到呼吸平匀，心也跟着静定，如此一顿饭时，四肢百骸，无不和通，睡意既至，即便呼呼入梦，虽寐不昏。

苏轼的个性，乐与朋友群居，而不昵妇人，即使家中妇女，他也很少和她们说话。

宋代士大夫社会里，饮宴的风气甚盛，高等门第，家有伎乐，但以只应宾客为主，苏家虽也不能免俗，养了几个能歌善舞的侍儿，不过苏轼接待宾客，却有各自不同的对待，凡遇“不可与言”而又不得不招待的俗客来到，他就搬出“搽粉的虞侯”来，以丝竹和歌声来逃避乏味的言语；若遇佳客临门，则摒绝声色，只备清茗佳酿，相与坐谈累夕，兴会淋漓。

苏轼推托不掉应酬，他也乐意欣赏女性的明慧和美丽，他会用最美的辞章来赞美她们，赠诗作曲之外，甚至为她们作画，但都只是过眼云烟，从不轻付感情。

所以，苏轼能以生平不耽女色自豪，五十岁后，有诗曰：“已将镜镊付诸地，喜见苍颜白发新；历数三朝轩冕客，声色谁是独完人。”

固然，这是苏轼“不昵妇人”的性情，但与道家养生之说也有关系，黄州的“雪堂四戒”中，有一条即是“皓齿蛾眉，命曰伐性之斧。”他认为四戒中“去欲”最难，以苏武为例，他陷身胡地，啮雪吞毡，死生一线，但仍不免为胡妇生子，“乃知此事不易消除”，他的朋友中，如多情词人秦观、风流成性的杨绘和雅好声色的王巩，都经他再三劝告“戒之在色”。如王巩谪宾州，致书有曰：“粉白黛绿者，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，深愿以道眼看破。”

饮茶，是苏轼生活上的一大情趣，一大享受。但在北宋当年，茶的种植制作，还在推广时期，好茶不多，如丁谓于真宗朝所制“龙凤团”茶饼，每年仅产四十饼，只够宫廷御用，皇族以外是不敢想望的；至庆历朝，蔡襄努力改良品种，另创一种“小团茶”，欧阳修《归田录》记述：

茶之品，其贵于龙凤，谓之团茶，凡八饼重一斤。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，始造小片龙茶以进，其品纯精，谓之小团，凡廿饼重一斤，其价值金二两。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，每因南郊致斋，中书、枢密院各赐一饼，四人分之。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，盖其贵重如此。

嗣后，植茶事业不断推广，至元丰年间，神宗有旨下建州造“密云龙”，品质更是超越小龙团之上，宫廷赏资，限于王公近臣，所以苏轼珍视异常，自己偶尔品啜一瓿，绝不用以招待一般宾客。曾作很美的一阕茶词，专门歌颂这“密云龙”：

绮席才终，欢意犹浓，酒阑时高兴无穷。共夸君赐，初拆臣封，看分香饼，黄金缕，密云龙。斗赢一水，功敌千钟，觉凉生两腋清风。暂留红袖，少却纱笼，放笙歌散，庭馆静，略从容。



◎ 黄庭坚·王长者墓志铭

能够分享这珍藏的，据说只限于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张耒，只有他们来时，苏轼才吩咐家人：“取密云龙。”

一天，苏轼在外厅会客，忽命取密云龙，苏宅内眷总以为当是黄、秦、晁、张中哪一位来了，屏后偷窥，却是晚登苏门的廖明略（正一）。

二 苏门六君子

元祐之初，由司马光和吕公著举荐起用的盈廷朝士，大部分是苏轼的同辈朋友，但至面对现实政治，利害不同时，即使多年交好，立刻就变脸色。苏轼对于人情变化莫测，独自感叹道：“人之难知也，江海不足以喻其深，山谷不足以配其险，浮云不足以比其变。”

在苏轼的生活中，真能与他声气相通的，不过几个知爱的后辈，他如有所

汲引，也只这几个惯坐冷板凳的书生而已，此外，还有两三个书画名家，做在朝时期的诗伴画友而已。

说到晚辈朋友，人们立刻就会想到“苏门四学士”，即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和张耒。

黄庭坚与苏轼本为笔友，诗文往还已有多年，而从未识面，这次从监德州德安镇任上，被朝廷召为秘书省校书郎，甫于元祐元年入京，一月初八，第一次来谒苏轼，以洮河石砚为贽。

秦观登进士第未久，原在外任定海主簿、蔡州教授，苏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，除太学博士，做校正秘书省书籍的工作。

晁补之，字无咎，为从学苏门最早的一人，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，都是第一。神宗亲阅其文，称为：“是深于经术者，可革浮薄。”原为北京国子监教授，元祐初，入京为太学正，后迁秘阁校理。

张耒，字文潜，少年时在陈州游学，苏辙时任学官，深爱其才，苏轼是在老弟家中认识他的，称其文：“汪洋冲淡，有一唱三叹之致。”张耒感切知己，因从轼游。以进士官著作佐郎，原在京师。文潜虽自及第以来，一直度其苜蓿生涯，但长得躯干魁伟，大腹便便，貌似寺庙中的弥勒佛，陈后山咏文潜曰：“张侯便然腹如鼓，雷为饥声汗为雨。”刻画得非常传神。

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十一月，苏轼主试馆职。宋制，凡除馆职，必须具备进士及第，历任成资（符合一定的年资），经大臣保荐，学士院考试入等（合格），才能授职。

宋沿唐制，设昭文馆、史馆、集贤院，合称“三馆”。凡在三馆者，皆谓馆职，

职居校理、检讨，校勘以上者，皆称学士，地望清切，非名流不得处。

这次学士院举行馆职试，黄庭坚以李常或孙觉荐，晁补之以李清臣荐，张耒、晁补之、张舜民等五人，并擢馆职。黄庭坚迁著作佐郎，加集贤院校理，张耒、晁补之并迁秘书省正字。秦观未与荐试，因为他的“历仕成资”还不够格。

因为他们是苏轼主试所拔擢的职官，一日之间，建立了座师与门生关系，而他们后来都做到三馆检校以上的职务，所以并称：“苏门四学士”。

张耒有诗称述他们师弟兄人当年的风姿，如言：

“长公（轼）波涛万顷陂，少公（辙）峻秀千寻麓，黄郎（山谷）萧萧日下鹤，陈子（师道）峭峭霜中竹，秦（观）文倩丽舒桃李，晁（补之）论峥嵘走珠玉。”①

虽是一门之言，却颇能道出各人不同的风格，包括做人的风度和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在内。

诗中所说的陈师道，字履常，一字无己，又号后山居士，先由苏轼会同李常、孙觉合荐以布衣为徐州教授，后用梁焘荐，除太常博士来京，从苏轼游，踪迹甚密，所以有人把他和李方叔（廌）加上，合称“苏门六君子”。不过无己自言他的师承是曾巩，有诗曰：“向来一瓣香，敬为曾南丰。”后来他与黄庭坚共为江西诗派的宗师。

宋代制度，京朝小官，俸禄甚薄，而以从事文教工作的先生们为最穷。苏门这几位学士，自然不能例外。

不要说元祐初期，他们都还官小禄薄，即使后来官阶高了一点，依然还是穷酸。如秦少游于绍圣年间，已官黄本校勘，住东华门之堆垛场，与时官户部尚书的钱穆父（勰）为邻。某年春日，少游实在穷得过不下去了，做诗致隔邻的穆父求助，诗曰：

三年京国鬓如丝，又见新花发故枝；
日典春衣非为酒，家贫食粥已多时。

穆父立刻派人送了两石米去，周济他的困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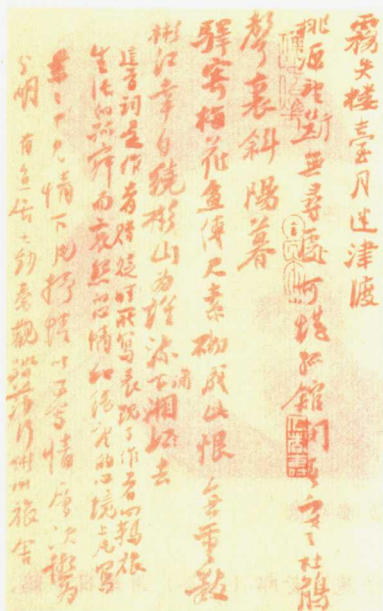
晁无咎也是一样，苏轼诗《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竹》说：“晁子拙生事，举家闻食粥……”

又《戏用晁补之韵》诗曰：

昔我尝陪醉翁醉，今君但吟诗老诗。
清诗咀嚼那得饱，瘦竹潇洒令人饥。
试问凤凰饥食竹，何如驽马肥苜蓿。
知君忍饥空诵诗，口颊澜翻如布谷。



◎ 秦观像



◎ 秦观·踏莎行

如陈师道，清寒耿介，一丝不苟，最后竟因无衣御寒而死。那是建中靖国初年的事，师道时任秘书省正字，被派陪祀郊丘。时值严冬，非重裘不能御寒，他只有一袭旧皮袍，他的太太与赵挺之的太太是嫡亲姊妹，就向赵家去借了一件，师道问这是哪里来的，他太太不敢隐瞒，从实说了，师道说：“你岂不知道，我从来不穿别人衣服的？”拒不肯穿，只着一领单裘到郊野去，竟感寒疾而死。时年才四十九岁。

元祐当时，苏轼位高禄亦较厚，而且依照惯例，撰内外制都有额外的“润笔”收入，如革宰相“蔴”，退即有旨，赐牌子金一百两。所以经济情况比诸在三馆的门人，要好得多。

不过苏轼向来不看重金钱，毫无积蓄，而且认为一般人所说的节俭，实是吝啬的别名。这时期，苏轼收入虽然丰厚，但他还是四壁萧然，室无长物，甚至不怕小偷光顾。曾自记元祐在京一事：

近日颇多贼，两夜皆来入吾室。吾近护魏王葬，得数千缗，略已散去，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。

苏门中以李廌为最穷，苏轼常常周济他。苏轼出知杭州时，朝廷赐物中有马一匹，便将它送与李廌，并且顾虑到李廌得马救穷，一定要卖的，则必须写张公据给他，证明来源，才能脱手。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张措辞婉转，又绝对不伤李廌自尊心的“马券”给他，原文是：

元祐元年，余初入玉堂，蒙恩赐玉鼻（驎）：今年出守杭州，复沾此赐。东南例乘肩舆，得一马足矣，而李方叔未有马，故以赠之。又恐方叔别获嘉马，不免卖此，故为书公据。元祐四年四月十五日。

这马券，后在眉州刻了石，有拓本流传。又有黄庭坚题跋一则，极饶风趣，跋曰：

“天厩马加以妙墨作券，此马价应十倍。方叔豆羹常不继，将不能有此马，或又责方叔受翰林公之惠，安用汲汲索钱，此又不识痒痛者从旁论砭疽尔。使有义士能捐二十万，并券与马取之，不唯解方叔之倒悬，亦足以豪矣。遇人中磊磊者，试以予书示之。”

苏轼的仁厚，不在赠马，在于那一番体贴别人的心肠。

不过，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精神世界里的满足，物质上的匮乏，不足以压倒他们。

苏门中人，各有独特的成就，相成的关系甚浅。

苏轼是个天才型的人物，挟其天马行空的气魄，逞其健笔，昂首高歌，赵翼论之曰：“坡诗不以锻炼为工，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，自然流出，一似全不着力，而

自然沁人心脾，此其独绝也。”

黄庭坚和陈师道却截然与他相反。庭坚认为文学上的成就，终须由积学而来，与徐师川书说：“诗正欲如此作，其未至者，探经术未深，读老杜、李白、韩退之诗不熟耳。”庭坚对于苏轼的天才和气魄，自知无法超越，故有意无意之间，想要另辟蹊径，出奇制胜，但是锻炼过甚，则不免走入生涩拗僻的魔阵。

陈师道是北宋第一个苦吟诗人，专心致志，逐字推敲，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传述道：

世言陈无己每登临得意，即急归卧一榻，以被蒙头，谓之吟榻。家人知之，即犬猫皆逐去，婴儿稚子，亦皆抱持至邻家。

如此呕心沥血做诗，与苏轼全凭才气的路子不同，所以后来他尽弃所学，与黄庭坚同宗老杜，开江西一派的诗运。

秦观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，故其文字抒情婉约、写景清丽，时人讥其纤弱，秦观亦自认少时用心作赋，习惯已成，虽风调优美，总脱不掉“词人之诗”的面貌。

张耒为诗，自然清新，务为平淡，颇受白居易的影响，而苏轼对他们两人，则曰：“秦得吾工，张得吾易。”

晁补之以文自雄，诗不如赋。

李廌文词肆放，苏轼称之“有飞沙走石之势”，诗亦才气横溢，似乎有点师门气概了，然而毕生穷愁潦倒，终至豪气尽失，变入幽逸一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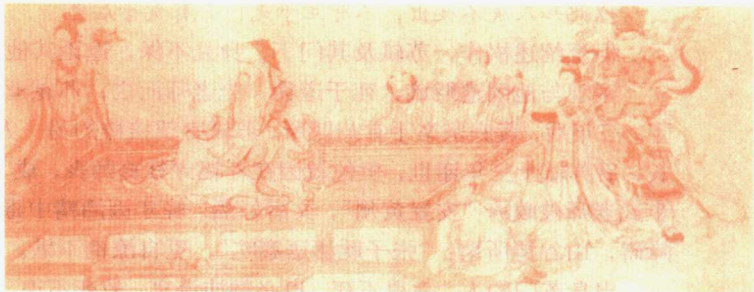
苏门师友，各有风格，而苏轼也真能尊重他人独立的成就，他自己是不受任何格律束缚的天才诗人，所以也不强人与他同调。正因有此涵量，所以他能网罗天下人才，创出自由的文风。所以东坡时代的宋诗，万象纷呈，各具自家面目，别有气象；尽脱唐人窠臼，赋予宋代文学以新生命，创出宋诗的新境界，下启江西诗派二百余年的新诗运。

苏门六君子中，苏轼独于黄庭坚则较敬重，一是山谷在诸生中，年纪最长，元祐元年，他已四十二岁，比苏轼只小九岁。两人相见时，黄已颇有声望，所以他们的关系始终是在亦师亦友之间；一是山谷少年早慧，很有一点恃才傲物的脾气，苏黄二人，格调不同，因为太熟的关系，有时也不免互为讥诮。如苏轼《论山谷诗文》说：

鲁直诗大如螭蛟，江珧柱，格韵高绝，盘餐尽度，然不可多食，多食则发风动气。

庭坚虽因后辈，不便指名直说，但言：“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。”意亦暗指轼诗。

秦观每以庭坚对苏轼的态度不够敬重，心怀不平。山谷《避暑李氏园诗》：



◎ 李公麟·维摩演教图



“题诗未有惊人句，会唤谪仙苏二来。”少游便向老师抱怨：“以先生为苏二，大似相薄。”但是苏轼并不在乎。

至苏轼下世，庭坚独尊诗坛，时人以“苏黄”并称，山谷连称“不敢”，他终生以师礼事苏轼，这种风范，尤其可贵。

苏轼在及门诸生中，对秦观的期望最深，因此，求全责备，态度也较严格。元祐初，少游晋京谒苏，一见面，苏轼便说：“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。”

“某虽无学，亦不至于如此。”少游诚惶诚恐地，不知此言何来。柳永是被他们共认为格调卑下的词家，苏轼一向瞧他不起，便说：“销魂当此际，还不像柳七的口吻吗？”

苏轼又问别作何词，少游举了一阕新作，中有“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雕鞍鞞骤。”这样两句。苏轼说：“用了十三个字，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。”摇首不以为然——苏轼指导后辈，精密如此。

苏轼当时，名满天下，不但一般士人，望之如北斗，谁不希望一登龙门，而身价十倍。

欧阳文忠开创出宋代文学的革新运动，得苏轼接替继续领导当代文运，发扬光大，虽已奠定非常深厚的基础，然而时光飞逝，苏轼现在也已进入中年，行将老矣，他必须要将欧阳交付给他的这根棒子，寻到一个有资格接棒的人，今如欲为交付，不能不把这份深重的责任，期望于这几个门人身上。一次，他公开这份心事于其门人曰（据李廌《师友谈记》）：

“国家的文运，必须要有名世之士，相与主盟，则此道统才不至于坠失，方今太平盛世，文士辈出，必定要使这一代的文运，有个宗主。”

苏轼在知杭州时，作《太息一首送秦少章》，表示他所属意的，是“秦得吾工，张得吾易”的秦张二生，言曰：

张文潜、秦少游，此两人者，士之超逸绝尘者也，非独吾云耳，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。

但在以后岁月里，他却并未放弃继续发掘人才的努力，直到身被窜逐蛮荒，他才断了念头，与李廌（方叔）书曰：

顷年于稠人中，骤得张（耒）、秦（观）、黄（庭坚）、晁（补之）及方叔、履常，意谓天不爱宝，其获益未艾也。比来经涉世故，间关四方，更欲求其似，邈不可得。

以此知人决不徒出，不有立于先，必有觉于后也。

但至绍述祸作，苏轼及其门下，身且不保，遑论其他。

秦观与他同遭贬谪，死于道途，先老师而亡；苏轼逝世这一年，陈师道也死了，三年后，黄庭坚卒于宜州贬所。苏轼寄望接棒的另一人——张耒，虽然年寿最长，后苏轼十三年谢世，但他就因在荐福寺祭奠师丧，成了罪状，被谪房州别驾，步武老师被政府“安置黄州”，文潜好酒，晚年因酒精中毒，患麻痹以致语言都有障碍，山谷诗所谓：“张子耽酒语蹇吃”，更自潦倒不堪。

出身苏门的人，幸得不死，也必颠沛流离，救死不遑，还有什么机会讲学，还有什么地位领导文运。文化帝国的太平盛世已经过去了，大局扰攘，根本没有文坛

存在，又遑论宗主。

——这是苏轼不复自见的一重悲哀。

三 王巩

乌台诗狱案内，因收受有讥讽文字，不申缴而牵连受罚的二十九人中，太原王巩（定国）是第一名，处分居然重过主犯，谪官监宾州酒盐税。宾州（即今柳州）为广南滨海烟瘴之地，比黄州、筠州都更远、更荒僻。苏轼获罪之初，不暇自哀，耿耿于怀者，是那些被连累的朋友，尤其对于远谪的王巩，更加难过。怕他会心怀怨恨，又不敢写信去问讯，成为心理上一个极其难堪的重压。

幸而王巩于启程前先已来了信，使苏轼有机会倾吐自己的歉疚。复书曰：

某启：罪大责轻，得此甚幸，未尝戚戚。但知识数十人，缘我得罪，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，流落荒服，亲爱隔阔，每念至此，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。

今得来教，既不见弃绝，而能以道自遣，无丝发蒂介，然后知定国为可人，而不肖他日，犹得以衰颜白发，厕宾客之末也，幸甚，幸甚。

苏轼认为王巩是两代宰相家的贵族子弟，一向娇生惯养，怕他吃不了远谪南荒的辛苦，谁知王巩却很坚忍刻励，和苏轼在筠州一样，晨起到税局去做盐税酒税的杂事，下班后，穷经著书或则诗酒自娱，生活得还很安宁。

在黄州的第三年，王巩自宾州寄诗来，苏轼有《次韵和王巩六首》之作，清清楚楚写出他的歉疚，要为他祈祷的沉重的心理：

况子三年囚，苦雾变饮食，吉人终不死，仰荷天地德。……此行我累君，乃反得安宅。

苏轼在黄州，最常挂念的，也是远谪广南的王巩，那年重九，登栖霞楼，凄然歌《千秋岁》词，所念即是王巩：

霜降水痕收，浅碧鳞鳞露远洲。酒力渐消风力软，飐飐，破帽多情却恋头。
佳节若为酬，但把清樽断送秋。万事到头都是梦，休休，明日黄花蝶也愁。

此词末句，特为引用从前在徐州逍遥堂中，夜与王巩和诗的旧句，缱绻的旧情与无凭的人事，交织成寥落无归的沉哀，自有一种震撼感情的力量，使当日同座诸人，不论认不认识王巩的，都为之想望这位漂泊岭外的朋友。

所幸元丰六年，王巩先自宾州放归，苏轼欣慰非常，作《次韵王巩南迁初归二首》，对于定国“归来貌如故，妙语仍破觥，那能废诗酒，亦未妨禅寂。”一场因他牵累而起的灾难，平安度过，庆幸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其实，在这三年中，王巩的遭遇很坏。“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，一子死贬所，一子死于家，王巩亦病几死。”（《王定国诗集序》）但是王巩从来不怨苏轼，还时时和他谈论昔日徐州从游之乐的旧事，苏轼一面欣然见他“十年冰蘖战膏粱，万里烟



◎ 黄庭坚墨迹

波濯纨绮。”的新境界，一面则怅然对他说道：“却思庾岭今何在？更说彭城真梦耳。”新近度岭的痛苦经验都已忽然过去了，哪里还有徐州游乐的梦痕？——经历忧患的苏轼，深深体认了人生的虚幻。

写上述诗时，苏轼也已离开黄州，在江淮一带求田问舍，预定明春去南都谒见王巩的岳父乐全老人张方平。后来王巩去了汴京，所以苏轼到扬州、到南都，似乎都未曾与他相见。

王巩有一歌姬，姓宇文，名柔奴，眉目娟丽，颇善应对。其家世住京师，从王巩南迁，苏轼后有一次问她：

“广南风土应是不好？”

“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。”柔奴回答。

这似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，但在一个体验过忧患的人听来，却如针刺要穴，凛然感到语中充满着哲理和智慧。苏轼特地为她填了一阕《定风波》词：

常羡人间琢玉郎，天应乞与点酥娘。自作清歌传皓齿，风起雪飞，炎海变清凉。
万里归来年愈少，微笑，笑时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
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，宣仁太皇太后听政，下诏求直言，一时上封事者五件，司马光看详，以孔宗翰居第一，王巩第二，因此得早两年“磨勘”，司马光荐为宗正寺丞。元年八月，本来已有颍州通判的新命，尚未赴任，苏轼荐举他充“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”的制科试，不料为台谏们斥为奸邪，斥为谄事苏轼。这句话非常刺激苏轼，不得不大声驳斥道：“臣与王巩，自幼相知，从我为学，何名谄事。台谏要攻击的是我，王巩受我连累而已，这样无理诬陷，能不令人悚惧。”一阵扰攘之后，王巩终被出为西京通判，他又是苏门中第一个代罪的羔羊。

因此，苏轼和王巩元祐初同在京师的时间，还不到一年。王巩在西京通判任不过七、八个月，二年秋间又转任扬州通判。其时，京师的党争已很激烈，苏轼自己正在进退两难的煎熬中，所以并不希望他回到这红尘滚滚的京朝里来，作《次韵王定国倅扬州》诗，劝他不要再落红尘，在扬州好好写书：

此身江海寄天游，一落红尘不易收；
未许相如还蜀道，空教何逊在扬州。
又惊白酒催黄菊，尚喜朱颜映黑头。
火急著书千古事，虞卿应未厌穷愁。

然而，王巩在扬州不到一年，又被人打下来了，三年秋后，回到汴京。

朝中大老韩绛的母亲，是王巩的姑母，他们两人是姑表兄弟。这几年间，王巩命运乖舛，三年瘴疠，万里生还。适逢元祐政局初变，他鼓勇上书，极欲有点作为，自见于世，韩绛身为门下侍郎不是没有汲引王巩的能力，但他非常自私，不仅借口避嫌，不予推荐，眼看他被台谏们斥为奸邪，排挤



◎ 东坡高望图